

制造业“外迁”与“留驻”的两难问题如何破解

——评《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与“回流”的动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所做的探索

敦 鹏¹ 谢丽丽²

1. 河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中国·河北 保定 071002

2.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the Cordilleras, Baguio City, Benguet 2600 Philippines

【摘要】制造业经常面临“留驻本国”还是“外迁国外”的两难选择。“回流”之后又会面临“外迁”与“回流”的两难抉择。杨英法教授和王振、郭广伟合著的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与“回流”的动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与“回流”的动态做了完整而细致的研判,并对我国如何应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留驻;外迁;回流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公共文化服务耦合互动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HB21YJ042。

制造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和经济自立能力。但是,制造业又会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也容易污染环境。因此,制造业经常面临“留驻本国”(本文简称“留驻”)还是“外迁国外”(本文简称“外迁”)的选择。如再出现国内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导致制造业成本增加,又不得不迁往国外。但是迁往国外以后,又会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并引发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严重撕裂等诸多问题,回迁国内(本文简称“回流”)的呼声又会出现。但是,一国制造业一旦“外迁”,“回流”就很困难;即便花费很大代价实现“回流”,效益也难如预期,又会面临“外迁”与“回流”的两难抉择。

目前,我国正正处在由中高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的过渡环节,开始面临制造业的“外迁”与“留驻”的两难选择。据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往的经验看,因为劳动力价格高,环保意识增强,为了降低成本,减少污染,不得不将本国制造业外迁到发展中国家;但是,外迁后又会导致本国产业空心化,并引发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严重撕裂等诸多问题。

美国在20世纪,长期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是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但在20世纪末开始,制造业大量外迁,成为以金融和高端服务业支柱产业的,钢铁、汽车、化工等产业衰落,导致美国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就业机会减少,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严重撕裂。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吸引外迁到国外的制造业回归美国,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杨英法教授和王振、郭广伟合著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与“回流”的动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话题,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与“回流”的动态做了完整而细致的研判,并对我国如何应对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作者在该著中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意的见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该著作从美国制造业“外迁”的效应和态势分析中总结制造业升级中产业结构升级的一般规律,揭示美国制造业“外迁”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及其对美国制造业与其产业结构带来的升级效应。作者注意到有一种观点认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导致其走向衰落,由此作者分析了经济体工业化的进程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的动因和态势,指出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是制造业企业的市场化行为,是基于市场价值规律,为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高经营利润的必然和合理的选择,为制造业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

提供了机遇。作者认为,一方面在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制造业自产生以来也处在持续的升级发展之中,从粗放式制造业向集约型制造业升级、从低附加值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制造业升级、从要素驱动型制造业向创新驱动型制造业升级、从产业链低端制造业向产业链高端制造业升级、从传统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升级。且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不断开拓出更多新兴领域,各国制造业升级发展的本质就是要实现制造业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服务业占GDP的主要地位;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其制造业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制造业“外迁”给美国推动制造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推动了美国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以及产值和效率提高。航空航天、原子能工业、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化装备等新兴创新领域,推动其制造业附加值稳定增长,成为维持美国制造业强国地位及世界霸权的重要基础。因此,对于制造业外迁对于美国自身的影响,作者主张更为全面的认识,制造业“外迁”确实给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但只是美国经济社会“去工业化”的短暂阵痛,更为深远的影响是为技术和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其绝对增加值总体处于增长态势。作者对美国制造业“外迁”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及其为美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带来的升级效应的分析,有助于破除国内外学界关于制造业“外迁”会造成发达国家制造业衰落的片面认识。

其次,该著作从制造业升级中全球化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和要素成本控制与合理流动的一般规律出发,揭示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的产业经济动因及其逆全球化的本质,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灰暗前景做出预测性推断。作者认为,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及其制造业“回流”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将面临诸多困难,甚至难以实现。在该书中,作者对制造业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优化规律进行考察,指出现代制造业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伴随着世界市场的不断拓展和国际市场机制的不断健全。制造业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和国际市场的不断优化存在协同共进的发展关系,而其基本的推动力是制造业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全球贸易和国际分工的整体格局来说,经济全球化依然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任何国家想单纯依靠政府的或行政的强制力量去斩断符合市场规律的全球产业链的做法,会因市场规律赋予的强大的矫正作用而面临重重困难。在作者看来,全球化依然是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在该书中,作者带着鲜明的历史和理论

意识,将工业化推进与要素价格增长规律用于理解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策,指出制造业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其生产要素价格会呈现出上涨趋势,而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和“流动性陷阱”效应的不断凸显会不断压缩其本土制造业企业的产品利润空间,制造业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往往选择到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投资设厂,进而出现制造业“外迁”趋势。即便美国拥有当今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制造业科技研发体系,并掌握诸多制造业领域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但从要素配置、成本控制和生产体系构建的角度看,其强行将一些制造业的生产环节迁移到美国本土的做法,并不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市场规则,实际上就是违背了价值规律,从战略的高度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所遇到的实现难度未来也相当巨大。对此,作者提出,美国制造业“回流”在当前遇到的障碍主要体现在美国国内需求不振,其制造业振兴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强;美国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高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美国制造业缺乏相应的配套产业链以及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已经受到严重冲击。作者以上见解揭示了美国制造业“回流”逆全球化的本质,并对其灰暗前景做出预测性推断。

再次,该著作分析中美两国在国际制造业分工格局下的产业和贸易竞争问题,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和升级需要,探索国内制造业和产业结构升级在美国强力推进制造业“回流”形势下,应当采取的对策。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相互之间的贸易规模和产业链协作等有关经济产业发展的各个方面不仅规模巨大,而且遭遇国际政治的角力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更具复杂性。在该书中,作者分析了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实践效应,美国为推进制造业“回流”采取的一些举措势必会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到我国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发展。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会对我国整个出口贸易环境造成冲击,在国际市场上加剧中美制造业之间的竞争,降低外资流入对我国制造业升级的要素支持,技术、资本和贸易封锁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培育和发展造成抑制性竞争。作者提出,随着我国加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在先进制造业培育中取得更多突破性成就,中美在先进制造业发展中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美国企图通过推进制造业“回流”将我国制造业升级发展遏制在起步阶段和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锁定在中低端的设想应当在我国先进制造业培育中得到警醒。基于此,作者认为我国应当在科学评估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现状及其实践效应的基础上,采取切实的应对措施,在尽量减少美国制造业“回流”冲击和负面效应的同时,将其转化为我国制造业创新驱动升级发展的良好契机,构建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机制,积极推进传统制造业技术升级,积极发展生产性服务行业,努力掌握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同时保留并推进低端制造业技术升级改造^[2]。

最后,该著作针对美国制造业“外迁”和“回流”问题带来的关于避免制造业“外迁”的认识误区,提出依据制造业种类及其对国家经济社会安全的重要性合理控制其国内外产业布局比例,积极推进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向服务业为主的升级,推动制造业发展动力结构由以要素驱动为主

向以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努力掌握制造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占领制造业国际产业链高端位置。作者认为,美国制造业“外迁”促进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创新驱动发展机制不断优化,其产业结构和制造业服务体系不断升级发展,由此可见美国制造业“外迁”对其造成的影响整体是利远远大于弊。因而,美国在制造业发展中曾经走过的“外迁”历程可以给我 国制造业发展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以及国民经济中制造业与农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等问题提供借鉴。一方面,“外迁”是制造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正常现象。正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在发展到工业化中期时的规律性体现。纵观我国制造业现状,经历4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内也出现了制造业“外迁”的客观需要。一些制造业企业已经掌握了行业内的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已经具备了“走出去”,与发达国家制造业企业开展国际竞争的能力。在此背景下,我国应当积极借鉴美国制造业“外迁”的经验,鼓励有实力、有能力和有需要的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更加充分的利用国际生产要素优化企业的资本结构,在不断提高自身经营收益和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配合国内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先进制造业培育和产业升级。同时,作者也指出,在积极推进国内制造业“走出去”的同时,还要积极避免出现产业空心化,重视制造业对现代农业和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作用。作者的见解破除了应避免制造业“外迁”的认识误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我国则应当在制造业升级发展中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趋势,并积极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要素,服务于我国制造业的创新驱动升级发展^[3]。

该著作作者始终保持客观严谨的态度,以实际统计数据 and 历史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针对性强,具备了一部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应有的特质。我国正处在由中高收入经济体迈向高收入经济的过渡环节,开始面临制造业的“外迁”与“回流”的二难选择,需仔细研判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外迁”与“回流”的效应与态势,取其成而避其败,借以预先规避可能带来的消极效应,而将其积极效应发挥到最大。杨英法教授等新近出版的这部著作所作的详尽研析和提出的具体建议,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均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 [1] 杨英法,王振,郭广伟.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与“回流”的动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11.
- [2] 王昌林,盛朝迅,苑生龙.特朗普“制造业回流”政策对我国产业的影响及应对[J].全球化,2017(08):62-68,134.
- [3] 胡国良;王继源.全球产业布局调整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外迁问题研究[J].上海企业,2020(01):50-64.

作者简介:

敦鹏(1983-),男,河北鹿泉人,哲学博士,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经济伦理研究。

谢丽丽(1984-),女,河南鹿邑人,菲律宾凯迪雷拉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21级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学研究。